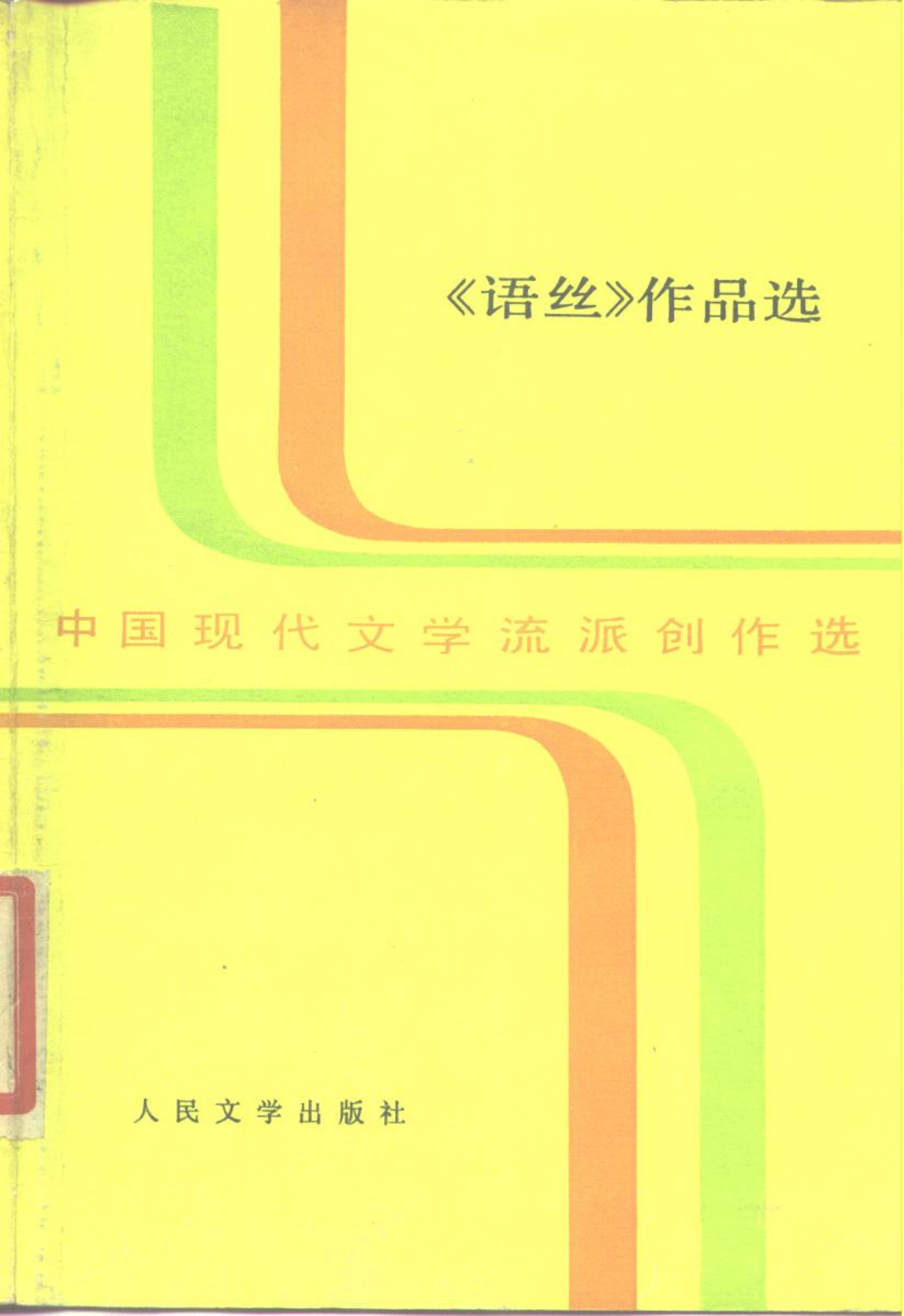




《语丝》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语丝》作品选

张 梁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语丝》作品选

«Yusi» Zuopin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72,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2\frac{5}{16}$ 插 页 1

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50

ISBN 7-02-000200-5/I·201

书 号 10019·4247 定 价 2.75 元

前 言

张 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语丝派”，因《语丝》(周刊)而得名。

《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前三年，由周作人主编。一九二七年十月，《语丝》和它的出版所北新书局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和封闭。同年十二月迁至上海复刊，由鲁迅接编。一年左右后，交由柔石代编。柔石编了半年，交给北新书局，又由李小峰编辑了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三月出完第五卷后，就自动停刊了。刊物前后历时五年，每年一卷(前三年不分卷)，每卷五十二期，共出二百六十期。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这六年间，包括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和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头两年。这是中国革命风云变幻、斗争异常复杂、尖锐的重要转折时期。“语丝派”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团体，经历了诸如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语丝派”的成员与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想的斗争中，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①的思想特色和“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

^①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

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①的政治态度。《语丝》在鲁迅接编以后，在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斗争，成为在左联成立以前的重要文化阵地。

《语丝》刊登的文章以简短的杂文和短评为主。虽然也兼采小说、诗歌、戏剧等文艺创作或翻译，但提倡最力、写作最勤、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散文，特别是杂文的创作。这也并非无因。《语丝》的宗旨，正如周作人代拟的该刊《发刊辞》中所说的那样：“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②，反抗“一切专断与卑劣”^③的思想和事物，而散文（包括杂文）自然是贯彻这一宗旨的最为有力和简捷的文体。如果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在文艺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语丝派”则以其泼辣、幽默的杂文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创作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

鲁迅说：“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④尽管鲁迅对这种“不虞之誉”表示反感，但却说明了来自不同阵营的敌我双方，都承认鲁迅是“语丝派”的代表者或领导者。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鲁迅作为“语丝派”的领导者，主要是体现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上。从《语丝》创刊至停刊的五年间，鲁迅相继发表了包括杂文、小说、散文诗、散文、论文、序跋、讲演等不同体裁的作品计一百四十余篇，数量之多，超过了鲁迅一生中投稿的任何一种刊物。其中，杂文七十多篇，占全部发表量的

①④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

②③ 见《语丝》第一期。

一半，收在《坟》、《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以及《集外集》里的许多篇什，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此外，《野草》里的全部散文诗，《彷徨》里的《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也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语丝派”的那种政治态度和思想特色，特别是《语丝》时期的杂文创作，标志着这一文体的发展和成熟。“语丝派”的其他重要成员如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等，在历次重大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写了不少文章，艺术上也有各自的成就和特色。尽管其中有的人以后的发展道路有多么不同，他们在战斗的行进中暴露了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错误，但作为“语丝派”的成员、战斗的伙伴，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却未可忽视，他们在散文（包括杂文）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肯定。

《语丝》的诞生和“语丝派”的形成，应该通过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来考察。

随着《新青年》杂志的解散，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也宣告分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出现了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到了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促成下，建立了国共两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又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也向着纵深发展。这些都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在文化战线上，这一时期“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

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①。这是总的形势。但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一面以反革命的武力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一面则提出尊孔读经的口号向新文化运动反扑过来；已经投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也推波助澜，群相鼓噪，这是《语丝》诞生前后的文化界的形势。

“语丝派”的主要成员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参加者。“五四”退潮以后，他们大都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立场，继续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以反对封建势力和右翼文人为主要方向的民主斗争。在对当时文化界的斗争现状和对待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态度上，他们和鲁迅是基本一致的。《语丝》诞生以前，他们的主要阵地是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鲁迅在该刊曾先后发表过五十多篇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以及批判“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等的杂文。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川岛、顾颉刚、沈尹默等也在该刊发表过不少杂文、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作品。再加上文学研究会的北京成员王统照自一九二三年六月开始在《晨报》创办副刊《文学旬刊》，使《晨报》和它的副刊一时显得声光灿烂，打破了北京文化界的那种“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②，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但是，《晨报副刊》虽然是最早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刊，而《晨报》本身却是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它的增出副刊，容汇新流，不无招徕视听之意。特别是胡适和新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徐志摩、陈西滢等于一九二三年成立新月社后，就挤进《晨报副刊》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且介亭杂文二集》。

这块阵地，酝酿着文化战线上的一场新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初，《晨报》当局、某大律师的侄子刘勉己从欧洲留学回国，与新月社气类相似，遂相勾结，取代了蒲伯英成为《晨报》的代总编辑后，就想把孙伏园拉下《晨报副刊》编辑的椅子，把鲁迅等人从这块阵地上排挤出去。但是，由于鲁迅等人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影响较大，又碍于与孙伏园的人事关系，《晨报》当局不无顾忌，所以箭在弦上，引而未发。等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刘勉己蛮横无理地抽掉鲁迅（署名“某生者”）的《我的失恋》诗稿的所谓“抽稿事件”发生后，孙伏园愤而辞去编辑职务，以示抗议，鲁迅等人也相率退出，《晨报副刊》遂为新月社所占据。为了另辟战线，重建阵地，在鲁迅的支持和领导下，孙伏园邀集了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川岛、淦女士等十六人作为长期撰稿人^①，创办了《语丝》，并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了创刊号。

应该指出，《语丝》的诞生和“语丝派”的形成，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从《语丝》创刊的前后几年来看，北京文化界的斗争十分复杂。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以后，经过几年的力量积累和舆论准备，以占据《晨报副刊》为第一步，接着又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了《现代评论》杂志，开始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营垒。不久，代表文化界封建复古势力的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配合政治上的需要，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复刊了《甲寅》杂志。这两种杂志的出现，标志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来的前夕，中国反动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开始合流。尽管这两股势

① 这十六个长期撰稿人的名单，最早见于《语丝》第三期中缝：“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

力在政治性质上还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对待工农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封建军阀势力在政治上采取武装镇压的高压手段，在文化上则提倡尊孔读经，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这股复古的反动逆流中，“现代评论”派扮演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角色。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敢于和这两股势力对峙，并起而进行抗争的，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以《语丝》为主要阵地的“语丝派”。在这个意义上讲，“语丝派”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后，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形势下，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界进步力量的一次重新组合和集结。

因此，《语丝》的出现，也自然受到进步文化界的关切和注视。当时在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王统照就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语丝》的诞生，他曾撰文说：

一、二年来国内思想界之混乱可谓已达极点，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好的思想。一般人受了悠谬思想的余毒，到底也洗涤不清。……今《语丝》的发刊，就是向着冲破、批评旧思想，及提倡新的生活的路上走的。自然，我们读过这篇宣言（指《语丝》的《发刊辞》——引者）之后，非常盼望它能以坚持的办下去，自由的发挥意见，来作割决罗网的锋刃！①

王统照的话，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文化界对《语丝》诞生的热烈的反响和期望。无怪创刊号一出，读者争购，一连再版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还供不应求。一纸风行，《语丝》的社会影响大大超过了当时其他的报刊。

① 见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晨报副刊》，署名剑三。

《语丝》创刊之初，就把“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①作为思想斗争的主要目标。

鲁迅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杂文借流传于民间的关于白蛇娘娘的爱情故事，对顽固地维护封建制度、镇压无辜的权势者作了嘲讽，赞颂了敢于蔑视权威、勇于反抗的民主精神。讲的是传说故事，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刺戟世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在《语丝》上陆续发表了《说胡须》、《论照相之类》、《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看镜有感》、《论“他妈的！”》等一系列的杂文。在这些作品中，从不同的历史角度戳穿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辛辣地嘲笑了现实生活中的封建复古派在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面前那种“推拒、惶恐、逃避，抖成一团”^②的顽固而又虚弱的本质。发表在第二十六期的小说《高老夫子》，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象“高老夫子”那样不学无术而以封建卫道者自居，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假道学”，正是充斥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那些所谓“上等人”的活写真。鲁迅还严正指出：谁想要抗拒新事物的成长，阻挡新潮流的到来，是不可能的，他热情号召革命人民要做一个“轨道破坏者”，“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③，表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战斗风姿！

① 鲁迅：《两地书·十七》。

② 鲁迅：《看镜有感》，《坟》。

③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

《语丝》的其他成员也坚持了这一斗争。如周作人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生活之艺术》，在探讨现代社会生活的时候指出：封建统治者的生活，实质上是“在礼教的面具下实行迫压与放纵”，并提出了全盘改造现实生活的要求。这类文章，周作人写得不少。其中如《狗抓地毯》、《我们的敌人》、《上下身》、《“净观”》、《道学艺术家的两面》等，都是较为著名的篇什。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揭露了封建礼教是“戕贼人性”^①的毒药，道教思想是那些“以维持礼教为业的名流、军阀”^②用来毒害和欺骗人民的工具。他直截指斥那些“张眼露齿，口咽唾沫”的“天地君亲师”，是“我们的敌人”^③。林语堂在《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一文中，猛烈地抨击长期以来浸淫于人们思想中的传统思想，指出：必须对旧社会的“遗物”作长期的斗争，而不容稍稍忽视。对于弥漫于当时社会上的复古、迷信思想和虚文缛礼，他认为都应该加以扫荡：“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而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④。再如钱玄同则针对章士钊所提出的“尊孔读经”的逆流，在第五十四期上发表了《废话》一文，对孔孟之道、十三经一一作了剖析和批判，认为章士钊的倒行逆施是“卑鄙至此，真要令人三日作呕”！

《语丝》不但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复古派加以剖析和批判，而且还刊登了不少各地读者汇寄的文章，对这类反面事物进行抨击。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语丝》上展开的一场与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进行的关于文言白话的论争。早在“五四”运动时期，

① 周作人：《半春》，《语丝》第一百二十一期。

② 周作人：《清浦子爵的特殊理解》，《语丝》第一百〇二期。

③ 周作人：《我们的敌人》，《语丝》第六期。

④ 林语堂：《给钱玄同的信》，《语丝》第五十四期。

曹慕管就以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而著名，他曾经把白话文比为“上海时装妇女，著高底西洋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①，对于这样一个封建顽固派，《语丝》自第九十六期至一百〇八期中，采用内稿外稿结合的办法，公布了曹慕管在澄衷中学的类似八股文考试的“国文试题”，又刊登了曹慕管本人的辩解，再刊登了四篇读者来稿，对封建复古派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和嘲讽。对曹慕管的批判，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这是因为早在一九二四年初，上海《学生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国故毒》的文章，也是对澄衷中学的复古派国文教学进行了揭露，曹慕管就依仗他的后台——封建军阀孙传芳对《学生杂志》大张挞伐，施加压力，最后迫使主笔道歉，编辑去职。《语丝》的这次斗争，火力猛，时间长，影响大，京、沪一带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或报道，大煞了封建复古派的气焰。

应该指出的是，《语丝》所进行的这种严肃的思想斗争，往往和现实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从《语丝》创刊到停刊的五年间，国内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语丝派”的成员共同支持过进步的学生运动——女师大风潮，抗议过“三·一八”大屠杀，撕毁过“正人君子”们的学者假面，驳斥过《顺天时报》的帝国主义侵略谬论，也揭露过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面目。例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语丝》第七十一期就发表了刘半农的悼诗《呜呼，三月一十八！》，这首诗以插页附入，用大号铅字排印，醒目突出，感人肺腑。第七十二期刊登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川岛写的悼念文章，实际上是一期“三·一八”惨案的纪念专号。

对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揭露和斗争，是“语丝派”一条重

① 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要战线，差不多贯穿了《语丝》的始终。如上文所说，在《语丝》创刊前夕，与新月社的斗争已露端倪，但还没有十分明朗。《语丝》诞生后，《现代评论》也紧接着创刊，两军对垒，遂为水火，斗争不但公开化，而且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也日益深入和尖锐。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与政治斗争中，写了一系列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对“现代评论”派的走狗面目尽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挞，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战绩。这一斗争，发展到三十年代初，就成为在“左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

在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鲁迅在《语丝》连续发表了《并非闲话（三）》、《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学界的三魂》、《不是信》等杂文，集中力量揭露了“正人君子”们的两面派伎俩和帮凶、走狗的本质，周作人也写了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揭露。发表在第七十五期上的《论并非睚眦之仇》就是女师大风潮发展到高潮时，对陈西滢的有力揭露，文章说：“我看不起陈源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陈源是章士钊的死党，即《现代评论》也不愧因而成为‘白话老虎话’”。他还和川岛一起在《语丝》不断揭露《现代评论》派收受章士钊津贴的丑闻和陈西滢诽谤北京女大学生“随时可以叫局”的澜言，使得“正人君子”们狼狈不堪。“语丝派”的其他成员如林语堂、刘半农等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语丝派”作为战斗集体，在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遇论战，成员之间互相配合、前后呼应，形成强大的战斗火力，易制敌于死命。例如，鲁迅首先在《无花的蔷薇》中揭露了徐志摩和陈西滢互相吹捧、标榜的行径。这种“戏

台里面喝彩”的做法，是揭露论敌的绝好材料，“语丝派”的成员就紧密配合鲁迅的文章，迅速展开了斗争。刘半农立刻写了《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川岛写了《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林语堂写了《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这些文章一齐在《语丝》第六十三期上发表。接着，第六十四期上刘半农又写了《奉答陈通伯先生》，衣萍写了《丢了三个》，周作人写了《陈源先生的来信》。这些文章，于嘻笑怒骂之间，对“现代评论”派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这种方式的斗争，形式多样，角度各异，但都集中在一个论题上，火力猛，声势大，使得“正人君子”们闻鞞鼓而望风披靡。

如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语丝派”对于封建军阀势力、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批判和揭露，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是非之争，还是政治原则上的敌我之争。虽然这种斗争往往诉诸纸墨，“语丝派”也不是什么政治团体，但它所进行的对于旧社会、旧思想的批判，往往从当时的斗争需要出发，包涵了丰富的政治内容，在客观上很好地配合了民主革命的斗争。郑振铎曾经说：“真实的冲突，却是《语丝》社、章士钊及《现代评论》社的争斗。那倒是货真价实的思想上的的一种争斗”^①。在封建势力盘踞的北京，高张反封建的旗帜，向着旧社会勇敢地挑战，这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和文艺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语丝》的命运屡遭颠踬。“三·一八”惨案后不久，段祺瑞政府“通缉”五十人的名单中，“语丝派”成员就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和孙伏园四人；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先是杀害进步报人邵飘萍，继而向“语丝派”开刀，最后，北新封，《语丝》停，只好转地上

①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海出版。鲁迅接编的《语丝》，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更重的压迫。先是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予以“禁止”；继而因为一篇揭露蒋介石的戏剧而受到“警告”；最后，主编鲁迅以所谓“堕落文人”的罪名被浙江省党部的老哥们呈请中央予以“通缉”。迫害之烈，说明“语丝派”的斗争，确是打中了敌人的要害。

三

鲁迅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有种种的变化”^①。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文学派别，由于思想上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成员之间不但存在着分歧或斗争，而且也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语丝派”内部的分歧、斗争，以及最后的分化，也大致如此。

“语丝派”内部的思想分歧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撰稿上的情况看，成员之间也各不相同。鲁迅在《语丝》上发表的作品，除了小说、散文以外，绝大部分是杂文。这些杂文几乎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势力，抨击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斗争概貌。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等主要成员也发表不少杂文、短评，表现了他们在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倾向，但他们也在《语丝》上散播了一些有害的言论。其他一些成员的情况就更不同了。例如，江绍原、顾颉刚发表的大都是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民俗学或古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几乎不谈政治；淦女士等偶尔也有极少量的涉及时事的短评，但绝大部分是小说和文艺漫谈一类的作品。特别是衣萍和稍后出现的废名，他们在《语丝》上发表的有一定数量的小说，大多是写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男女的恋爱纠葛和生活苦闷，甚至写他们酗酒、嫖妓的腐败生活；有的则是描写恬淡、宁静的农村生活或天真无邪的儿童心理。这些作品，与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时代相比，显得格格不入。不消说，这与《语丝》注重社会、思想批评的宗旨，也是相悖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成员之间的思想以及趣味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再从在对敌斗争中对待某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 看，“语丝派”成员之间，“意见和态度也各不相同”^①。例如，在对待新月社这样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上，在《语丝》创刊时，就存在着分歧。徐志摩、胡适等人之所以曾在《语丝》上发表作品，显然是由于当时担任主编的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拉拢、姑息。虽然徐志摩、胡适的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面目在当时还未彻底暴露，但以《晨报副刊》的“抽稿事件”为前鉴，鲁迅对他们保持了革命的警觉性。其实，鲁迅洞悉他们的用意：要把刚刚诞生的《语丝》按照《晨报副刊》这个先例如法炮制，先插足进来，占领地盘，逐步蚕食，最后化为己有。很快，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把徐志摩比之为“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不管什么地方都飞到”的“麻雀儿”^②。同时，川岛也发表了《又上了胡适之的当》，对胡适的“考据癖”加以嘲笑。这就使徐志摩、胡适在恼恨之余，觉得《语丝》壁垒分明，不敢再来觊觎。然而，鲁迅后来回忆说：“《语丝》

①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

② 鲁迅：《“音乐”？》，《语丝》第五期。

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①。可见,这种矛盾、分歧在创刊之初就存在了。鲁迅之所以后来于《语丝》之外另外创刊《莽原》(周刊),以配合斗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不满于《晨报副刊》,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看到了“语丝派”内部的这种矛盾和分歧。

这种矛盾和分歧,在“语丝派”内部有所发展:在思想上最后表现为中庸和反中庸的斗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斗争。

作为一种妥协主义的思潮,“中庸”思想在“语丝派”内部早就存在。最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他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在《语丝》上散播了大量的妥协主义论调。只是由于急速的政治斗争是“语丝派”的主要斗争目标,因此,《语丝》内部蕴含着的中庸和反中庸的斗争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罢了。例如,周作人在《语丝》上提出过所谓“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②的主张,散布过“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的养成。……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③的论调,一直到提出所谓“语丝文体”应该是“费厄泼赖”的主张。如果离开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来看“宽容”、“费厄泼赖”等论调的实际涵义,那将会不得要领。“费厄泼赖”也是英语“Fairplay”一词的音译,对它的含义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如果把周作人的这些主张和论调与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看,其真正的涵义就清楚了。例如,在周作人提出“费厄泼赖”的第五天,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

① 鲁迅:《集外集·序言》。

② 见《生活之艺术》,《语丝》第一期。

③ 见《黑背心》,《语丝》第七十一期。